



党校课堂里的一次革命

□ 谢煜桐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在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历史上，三次改组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大事件，是党中央革新党校办学思想，从而使中央党校更好地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重大举措。

中央党校第一次改组，发生在1941年底，由毛泽东最后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对中央党校的办学作了重大调整。《决定》规定：“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根据《决定》，毛泽东、任弼时、彭真等共同商讨制定了《中共中央党校计划》，计划共16条，对党校教育的目的、学生入学条件、学生来源、班次设置、学生待遇、修业年限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为中央党校制定了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2年1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对这次改组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

1942年2月1日，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又在中央党校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第一次改组后，特别是毛泽东的上述两次报告后，党校的教学并没有大的改观，没有体现出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脱离实际情况仍然十分严重。联系到一段时间以来党内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党校教学上存在的问题此时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教育

的技术和方法问题，甚至也不再仅仅是学校的教育方针问题，其本质上已是党的作风问题，即是否符合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既然是党的作风问题，当然就不能等闲视之。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内中规定：“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中学习党的路线”，“军事学院高级班归并党校”，“延安各机关学校高级干部（包括高级学习组）共以三百至四百人为限度，参加党校学习”，“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等等。4月1日，《解放日报》以《中央党校再度改组告竣，确定新教育计划》为题进行了报道，文中提到，据负责中央党校政治教育的彭真介绍，中央党校再次改组的目的是使党校教育能完全吻合毛泽东整顿三风的精神，中央党校的教育内容将以辛亥革命至今的中国历史为基础，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第三次改组发生在1943年3月。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

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并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此即中央党校第三次改组。改组后中央党校开办了第二期，办学规模迅速扩大，从一个部发展到六个部，在校学员最多时达3000人，改组与整风相结合，使得中央党校的整风大大推动了全党范围的整风。

对于三次改组的意义，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中有一段评价性的话，他指出：“在党校中有两种培养教育干部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把人都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在两年之内提高一步。”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三次改组重大意义的一个总的评价。通过三次改组，党校不论在办学目的、方针，还是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理论联系实际教育方针的确立，意义尤为重大。这个问题的解决，大大促进了党的学风的整顿，而学风又为党风之要。在这种意义上讲，把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看成党校课堂里的一次革命，也毫不为过。



沈传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党的决策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道路为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沈传亮

“中国道路为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道路决定命运、关乎兴衰。从个人到国家，都是如此。对中国来说，从农业文明的角度看，我们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5000多年文明延续不断。但近代以来，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碰撞过程中发生了逆转，尤其是1840年以来，中国陷入了一个因落后而挨打的悲惨境地。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想了很多方法，试验了各种方案，也选择了不少道路，但最后都是抱憾而终。在风云际会、时代大潮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使命性的政党，理想最崇高、使命最远大，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重任。她的确没有辜负中国人民的高度期望，带领着中国人民浴血奋战28年，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能够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条路可以说来之不易，正是因为走了这条路，中国才创造出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所谓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是比较而言的。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只能造一些桌子、板凳、茶碗、茶壶，连像样的飞机大炮都造不出来。而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制造能力位居世界前列。目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0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我们原来很穷，人均GDP也比较低，而2018年数据显示达到了9000多美元，2019年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从社会方面来看，中国的人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不到35岁，增长到2018年的77岁，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我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2018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他在演讲时高度评价了我们的社会建设，他认为现在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时刻，中国实现了举世无双的经济增长和减贫。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就是社会稳定的奇迹。

那么中国道路为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呢？她生命力的密码来自何处？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共同思考的一个话题，需要从四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条密码是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搞革命也好，搞建设也好，我们也曾经有过没有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抄照搬别国方式方法的情况，但是历史表明，照抄照搬是不行的，使我们的事业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而往往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照抄照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制定出比较适合自己事业的政策，这已经为历史和实践所证明。

第二条密码是不断解放思想，推动体制机制的变革。从过去的一段历史来看，中国处于大变动、大转折的时期，往往需要思想解放。无论是新中国成立，还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甚至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前后。因为面临的矛盾和形势不一样，迫切需要我们打破历史的惯性，摆脱传统的思维，通过思想解放不断推动方方面面体制机制的变革。而在这个变革过程中有一个大变动，值得了解和重视。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勇敢地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了。这个结合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本身的特点结合起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断发挥市场的作用。初期的探索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环节发挥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又进行了不断的思想解放，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市场因素的介入，加上政府有效地发挥作用，中国的经

济增长、社会发展才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第三条密码是实施对外开放，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很多国家的发展都已经表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进步，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勇敢地拥抱世界，融入世界的潮流，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潮流，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从开放三个三角洲地带到设立海南省，设立海南经济特区；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到勇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后到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一系列举措，表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吸收了很多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借鉴了很多国外的高科技技术，包括还吸收了很多国外的投资，通过开放推动发展，因此，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有了一个质的发展。

第四条密码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中国的发展是个大国的发展，很多关系需要处理好。比如怎样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来领导。在中国最有力的政治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强调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通过坚强有力有效的领导，使得方方面面的事业越发展越红火。当然，既要坚持好党的领导，还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提高党的执政本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随后党中央又提出要提高斗争本领。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因为面临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保持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扬帆远航、抵达目标，需要党的坚强有力领导。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取得成功的关健和根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走对了。

选择很关键，坚持更重要。既然这条道路走对了，又被历史证明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必由之路，我们就要坚持下去，只有坚持走好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够继续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才能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校公开课（六）

怎样看待《西游记》的“证道”

□ 陈文新



现存《西游记》的最早版本为金陵世德堂刊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即通行的百回本《西游记》，初刊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西游记证道书》初刊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是《西游记》流过程中的重要版本之一。其全称为《新镌全像古本西游证道书》，编者是明末清初的汪象旭、黄太鸿。读者今天看到的《西游记》基本上是以世德堂本为主，杂糅《西游记证道书》等其他众多流传版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与通行的世德堂本《西游记》相比，晚出现的《西游证道书》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第九回加上了唐僧出身的故事，即“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其二，在书名上冠以“证道”二字，并增加了“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的“原序”及《丘长春真君传》等文。需要指出的是，汪象旭、黄太鸿都是醉心于道教之人，增加“原序”，有可能是为了赋予《西游记》仙佛同源的“证道”理念。而由于“长春真人西游记”或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的丘处机为世人所知，增加相关内容，使《西游记》的“证道”意味得以有效突出。汪象旭、黄太鸿借虞集的《西游记原序》强调了“证道”的内涵就是“收放心”，文中写道：“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鬼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虽其书离奇浩汗，亡虑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则为安心，安心一心，则能作魔，其纵横变化，无所不至，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收，则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故学者但患放心之难收，不患正果之难就。真君之谆淳觉世，其大旨宁能外此哉？”意思表达很明白：《西游记》是一部“喻大道”的书。“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

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

《西游证道书》如此强化《西游记》的“证道”理念，是否具有合理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道”的理解问题，亦涉及如何看待文学与思想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始终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属性，“道”始终是人性修养的终极追求，因此《西游记》将“证道”理念作为小说中的价值取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一部经典文学，人们阅读和理解《西游记》必然还涉及对文学与思想关系的认识问题。一般而言，二者在文学史上存在三种关系：一是文学与思想的部分内涵是重合的，如明代唐宋派的古文，是文学作品，同时又是思想的载体。二是文学与思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宋明时期，以山水蕴道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哲学表达方式，许多山水诗词都以玩味自然风景的方式来悟道，以写景的方式来示道，这类作品承接了陶渊明的传统，是文学与哲学结合的成功范例。三是文学与思想相对疏离。文学家感受世界并将这种感受文学化地表达出来，思想家思考世界并将这种思考严密深刻地表达出来，二者间并无多少关联。

阅读《西游记》，如何把握小说所蕴含的心性修养宗旨，所面对的正是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学术史上出现过两种偏颇：一是过于拘泥、过于严肃地阐释寓意，二是完全否认其中的寓意。代表前一种倾向的是一批明清时代的学者。在点评这部小说时，明末幔亭过客（即袁于令）从三教合一的立场出发谈寓意，清初汪象旭、尤侗、张书绅分别从道教、佛教和儒家的立场出发阐释寓意，立场虽别，但所揭示的修身养性意蕴则是大体一致的。这一情形并不奇怪。盖儒、释、道三家都有自己的心性



修养理论，各自的最高境界亦有不同称谓，但相互之间确有共同之处，即都致力于对欲望的克制。《西游记》兼容三家的心性修养旨趣，故时而谈禅，时而说儒，也常有道家术语。就这一事实而言，明清时代的很多学者都认同，认为《西游记》确有“喻大道”的功能，但他们说得过于拘泥和严肃，以至与《西游记》的戏谑风格明显冲突。作为对这一倾向的反拨，一些近现代学者或读者则完全否认小说的寓意，反对过于拘泥地去搜寻微言大义。他们认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有太多微妙的意思，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读者不用深求。相比这两种观点，鲁迅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他在著《中国小说史略》时论及《西游记》，一方面认为《西游记》“每杂解颐之言”，“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另一方面又指出“假戏趣求大旨”，则“求放心之喻”，足以尽之。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在阅读《西游记》时，不应得“象”忘“意”，更不能得“意”忘“象”。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西游记》以降妖伏魔为主体。从修身养性的角度看，“魔”就是人的欲

